

「志願部門」如何維繫可欲之社會價值：

一項初步的理解

王篤強
蘇文彬

近年來有關志願服務工作的推動，在政府部門專案倡議以及民間組織熱心參與下，正轟轟烈烈的在各界展開。適逢二〇〇一年正是國際志工年，相信對此事無論在意義上、或是在實務操作上必然有著更為深刻的闡發。

不過，回顧國內社會工作相關文獻，包含學術以及實務界，對於志願服務的探討大抵著重於志工內涵、志工特質（如參與動機、滿足感提升等）、志工組織（如組織分類、招募管理、資源取得、成效評估等）、以及志願部門與其他部門關係（如福利供給型式、與國家、市場部門間彼此關係等）的討論。（註一）這些討論對於志願服務的理解和推動當然有著相當大的助益。但美中不足的是，關於我們為什

麼要推動志願服務工作、或者倡議志願服務工作到底透露了什麼樣可以移易俗改善風氣的機制等疑問，要不是少有關切，再不就是簡單帶過。為此我們覺得殊為可惜。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就直接以「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如何維繫可欲的社會價值」為題，從「志願部門」所具之特色著手，提出我們尚嫌粗略的整理，希望能夠因此拋磚引玉並且就教方家。

壹、「志願部門」的意涵

「志願部門」與「福利多元主義」之間關係匪淺。根據姜森(Norman Johnson)(1987)及艾維士(Adalbert Evers)(1993)的說法，「福利多元主義」一詞首見於研究志願組織未來的

「瓦芬登報告書(Wolfenden Report)」。該報告書係Rowntree Memorial Trust委託英國瓦芬登爵士主持，針對英國過去志願組織角色及功能所研究出的成果。其中贊許與哈德雷(Stephen Hatch and Roger Hadley)二位提出「福利多元主義」一詞(Hadley and Hatch, 1981轉引自Til, 1988; Evers, 1993)，並在日後為姜森所繼續使用(Johnson, 1987)。

而我們從「福利多元主義」的論旨（註二）中發現，「志願部門」（註三）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關鍵性的角色。所謂「志願部門」其內涵如果參照姜森（一九八七）的看法，在區別出由親友、鄰里、家庭、社區所提供照護的非正式部門之後（Johnson, 1987），它包含了諸如

鄰里組織(neighbourhood organizations)、自助或互助團體(self-help or mutual-aid groups)、供給不同案主群各式服務的組織(organizations providing services for groups of clients)、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s)、與醫療或社會研究有關的團體(group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medical or social research)、與協調資源供給及其他團體有關的中介組織(Umbrella or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other groups and the provision of resources for them)等單位。本文中為求能與姜森所提出福利供給部門區分相一致，因此在以下行文時均以「志願部門」為代表。

至於，「志願部門」(特別是在美國)之所以被稱許並看重的原因，則是因為它被賦予了諸如展現了自發的利他德行、構成了共同體(community)彼此凝聚的根源、有利民德(habits of the heart)的建立、並且對抗孤獨，確保民主、有助公義、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等特性(Til,1988)。面對這些特色，我們將繼續追問志願部門到底是透過何種機制產生上述種種令人稱許的特色？

我們參考艾維士(1993)、伍斯諾(Robert Wuthnow)(1991)等人將「志願部門」視為國家、市場、社區(即含親友、鄰里、家庭、社區之非正式部門，以下均同)間中介結構的說法，說明居於上述三者中介地位的「志願部門」如何促成並維繫可欲之社會價值。經詮釋並整理艾、伍兩位觀點後，我們認為此說可以從「志願部門」作為混同各方理性的「力場(tension field)」，以及作為「中介調和(intermediary)結構」等兩個面向來解釋。

貳、「志願部門」特色之一： 作為混同各方理性的「力場」

要理解「福利多元主義」底下「志願部門」如何作為混同各方理性的「力場」，必先認識「公民社會」的理論框架。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們將從「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論著手，然後說明「志願部門」屬於「公民社會」中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的一個面向」，以及「它集合了不同的理性和不同的論述，形成了彼此共存、相互摻雜，而難有明確區分的力場」這回事。

「公民社會」理論其形貌相當複雜，即便civil society一詞也往往因不同時期不同論者而有不同看法(註四)。所幸它非本文主要目的，所以不擬深究，並因此逕行參引上述艾、伍二氏的論點就一般看法區分外在描述與內在構成兩個部分提出說明。首先，在「公民社會」理論的外在描述部分，它是項用以分析也是項用來說明國家、市場、社區三者所共同構成之社會領域(social field)的理念型(請參考附圖)。在該領域中，生活在市場式民主體制下的人們藉由志願結社的方式來表達各式各樣的興趣或利益(interest)。這些興趣或利益包羅萬象，內容極廣，並沒有特別的限定。例如，它可以是政治的(利益團體)、社會的(公益慈善、文化的某種價值倡導)、也可以是休閒娛樂的(琴棋書畫詩酒花)，不一而足。不過，由於它是民間志願自發、自動聯合而成的團體，所以也稱「志願部門」。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這項透過志願聯合所形成的部門，它還具有「公共空間」這項向各方勢力開放的特性。由於它向各方勢力開放，所以因此不受國家、市場、與社區等任一單方勢力所專擅。而這也同時意味著在此一社

會領域中的「志願部門」，它是一個各方勢力的角力場，其發展、取向、乃至策略同時受到空間中其他志願團體，以及構致力場的國家、市場、與社區等多方面的相互影響。所以，若就樣貌言，處於公共空間中的「志願部門」其樣貌會因各方角力後所呈顯的不同比重而有不同的表現。例如，三方角力後若市場理性勝出者則該組織便傾向展現較強的市場牟利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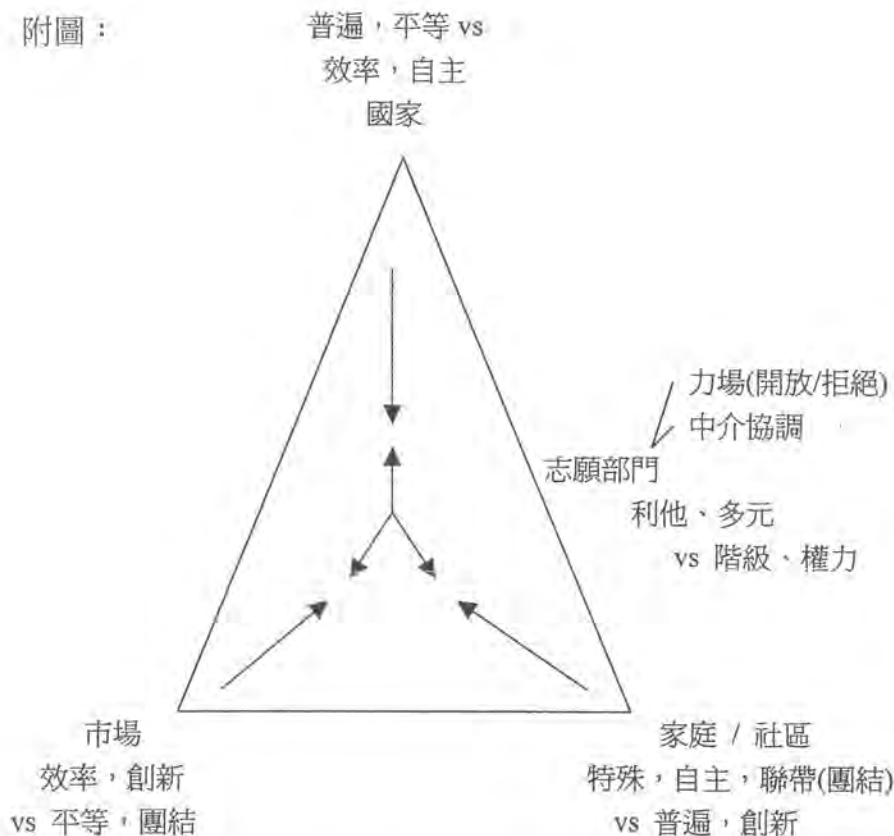
然而，受各方勢力影響下的「志願部門」並不僅僅只是被動接受外來力量左右，它本身亦帶有各種不同文化、社會、乃至意識型態的背景，並從而反應出特有的論事以及處事態度。所以它不能抽離論之，必須擺在其所置身的特有背景下才能理解。正因為如此，使得它在深受各方勢力牽制之餘，依然還能保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例如，受宗教組織資助而從事福利服務的志願團體，在從事服務時便有別於一般帶有政治經濟目的的團體（如政黨），它來者不拒，不以是否具有成員資格為考慮對象，就是一例。不過，即便如此，公共空間中依然還有其他形態不同樣貌各異的組織，因此我們稱它只是其中一個面向而已。總之，綜合以

又帶有公共空間向各方力量開放的特性，所以我們用「志願部門」屬於「公民社會」中公共空間的一個面向」來為「公民社會」理論作

外在的描述。

然而，以上的說明只及於「公民社會」理論的表面，對其內在構成並沒有細說。所以

附圖：



關鍵字：志願部門、第三部門、非營利部門

在結構層面部分，我們要說明的是構成「公民社會」中公共空間的市場、國家、

接下來，我們就從結構和歷史兩個層面由國家、市場、社區等「公民社會」理論的構成要元繼續闡明「志願部門」是不同理性、不同論述彼此共存、相互摻雜、而難有明確區分的力場」。

與社區，它們各受不同的理性所主宰(Evers, 1993)。例如，在市場領域中，主宰並且維繫經濟世界運作的是包含了工具性價值、尊重個人選擇、以及因彼此陌不相識(anonymity)而一視同仁的自利理性，在其運作下人與人、人與社會間則透過金錢而彼此相互聯繫。至於，在國家領域中，強調標準化、崇尚普遍性、要求一致性是它的主要運作規則。最後，在社區領域上，則以個人傳統義務與規範所構成的聯繫為其特徵。

上述三類理性不僅是分析的典型，在歷史上也曾經以「經濟的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與「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等不同型態的政治論述出現(Evers, 1993)。其中持「經濟自由主義」者首重自由市場下的對「個人(消費者)選擇」的尊重，因此保障公民權利對他們來說只是次要。好比他們以「保護消費者權益(consumerism)」為名，運用市場機制對照顧服務進行差別取價，就是例證。相反的，「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所關注的則是勞動者或是抽象的公民，他們認為秉持特殊主義、各立山頭的社區和小團體是進步和發展的障礙，所以主張

於普遍性、一致性，由中央計劃並且國家主導的福利供給體系才能確保平等和進步。最後，「保守主義」的倡議者則有別於上述，他們主張透過社區與家庭打造社會，認為社區和家庭可以培養公民義務和自主性。而在具體實踐上，他們則大抵經由減少福利增強家庭功能著手，如吉爾德(George Gilder)、莫里(Charles Murray)與米德(Lawrence Mead)在大體上就被歸為此類。

不過，以上三個領域的不同理性，乃至相應的不同政治論述，在「公民社會」中由「志願部門」所形成的公共空間裡，呈現了匯納百川、卻彼此約制的現象。單以市場領域中商品化的現象與過程為例，我們可以發現它除限制國家與社區對公共財貨和公共服務的界定空間外，也限制了社會領域中從事公共關懷、有助團結的結社意願。然而透過金錢聯繫彼此的方式，卻也因此打開了尊重個人選擇和一視同仁的平等空間(註五)。但問題是市場理性在開啓一視同仁這項空間的同時，不可避免的也聯帶破壞了支持社群的基礎以及彼此團結的社會關係。所幸在「志願部門」中，帶有各種不同目的或意識型態的各式組織，羅列其中，使

得它不被單一理性所獨佔。所以被排除於上述市場領域外的國家與社區，就可以透過諸如倡議採行市場干預或者強調鄉里互助社群團結等方式來約制過份膨脹、甚至妨礙美好生活的市場理性。換言之，位於公共空間中的「志願部門」向所有盤據在這個領域中的各種理性開放，同時也限制各種單一理性過度膨脹，因此形成了一個匯聚並且容納多元力量的場域。這些力量在大牙交錯的動態過程中不斷的互動直至取得暫時的均衡，並據此呈現出當時均衡狀態下的組織外貌。一旦力場中的內在均衡發生變化，則聯帶的使組織的外貌也隨之改變。所以艾維士以「福利混和中的混合物(Mix in the Welfare Mix)」來說明「志願部門」的這項特點。同時也因此有「志願部門」本身是個難以明確區分的力場的說法。

參、「志願部門」特色之二： 作為「中介協調」的結構

上述只針對「志願部門」做出了第一層次的說明，指出它是集聚不同理性而難有明確區分的力場。接下來要更深入析論的是，除作為力場之外，「志願部門」還具有「中介協調」

的能力。

在前文中我們言及「志願部門」具有匯納各方理性、求取力量均衡的功能。這項功能在經年累月之後將會形成中介協調社會領域中各種不同理性的機制，而該機制表現的強度則又繫乎生活在市場式民主體制下的人們折衝不同意見、平衡變遷、以及謀求生活秩序的能力（Evers, 1993）。根據艾維士對於社會領域中「志願部門」的研究指出，「志願部門」中的各式組織大抵分佈於「全面揚棄」或「類化接受（assimilation）」國家或市場這兩項極端所構成的光譜之上。前者諸如發動政治革命或近來於歐陸興起的自助運動；後者好比美國營利與非營利機構間的混淆不清、或德國志願組織與國家科層之間的關係密切。而位於上述光譜兩端間的志願組織，則帶有極大的彈性空間。透過這項彈性的空間，一方面呈顯了志願部門形貌上的混雜多變，再方面也提供了各方利益交換、彼此折衝、乃至達到平衡的領域。

當然，此處的利益交換、折衝整合、乃至達致平衡的對話或討論，並非想像中如水波不興般的平順，相反的它是建立在艾氏所謂

「衝突性的合作（conflictive cooperation）」上頭。這種「衝突性的合作」，較之於古代因衝突而彼此殺伐，代表了公共領域中的組織在處理衝突協調紛爭時有了長足的文明與進步。不過這項文明與進步卻非一蹴可幾的。因為它一方面需要透過「志願部門」發揮其特有的「中介性質」，既包容（容作爲力場）又協調（約制並整合），使不同部門在相互獨立之下卻又能彼此「嵌合（intemesh）」，並令整個體系獲得進步與調和；再方面它還需要在經年累月裡與不同領域不同理性的互動下，逐漸摸索、發展、累積出可資依循的規則。因此，從總體來說，「志願部門」的中介協調性格及其形成過程是動態的、是發展的。而據此，可以更進一步說，此種性格的強度將因各種力量間的折衝、協調、乃至整合的鍛鍊中更獲得加強。

肆、結語——

「力場」與「中介調和」是形成可欲社會價值的基礎結構

以上「志願部門」作爲「力場」、並擁有「中介調和」能力的詮釋中，我們以爲這兩項

特色形成了「可欲社會價值」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在這裡，所謂「可欲的社會價值」，是對立於「國家福利造成道德危機」論述下的批評（如欺騙、依賴、不工作、未婚懷孕、街頭犯罪等等），簡單說也就是在前文中所提及的那些由志願組織所帶來諸如有利民德、自發利他、鞏固民主、助益公義等優點。

但是這些可欲價值的取得並不是經由外力規定，而是透過伍斯諾（1991）所謂「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的方式獲得。這些「公共論述」的內容，包含了作爲人類我們應該要過什麼樣的生活？生活相關事項的優先順序要如何決定？有限的時間、活力、與資源又要依據什麼樣的目的來進行分配？以及什麼是我們的未來？什麼是我們彼此所預想的「善（good）」？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透過這類問題的相互辯詰，人們在多元豐富的環境下經由彼此約制、互動將可以產生符合社群需求而且爲衆人所共同奉行的行爲價值。

進一步仔細點說，這些問題如果僅僅置於國家、市場、或社區任何單一理性思考，將會因爲缺乏制衡的結果而受單一理性所宰制，並

產生前文所批評種種問題。但是如果置於前述的基礎結構中，則可以透過「志願部門」作為一種向外開放而相互約制的力場，防止其中任一力量（如國家、市場、社區）的專斷；同時也可以因「志願部門」作為一種中介調合的機制，得以整合各種力量使其不致失之零散。因為前者（作為力場）提供了催生新興社會價值的空間，使得新興社會價值不致在未能成形之前即受構成公共空間的任一力量所扼殺。當然在促生的同時，也因為在此一力場中各方力量彼此約制，使得新興社會價值在得到維持的同時卻又因此過度膨脹甚至導向新型的獨斷。至於後者（作為中介協調）則在前者的基礎上，說明了新興社會價值產生的內在過程乃是來自於「志願部門」的中介協調特性，經妥協整合其他理性之後所獲得的產出。最後，由這兩項基礎結構（作為力場、作為中介協調機制）所構成的「志願部門」，在形塑公共論述的過程中，也因此取得創造及維持可欲社會價值的功能。

當然，以上是西方志願部門倡議者言，也是他們立足於西方公民社會進行考察後所得出的結論。因此，反觀國內，我們同意國內部

分論者（如官有垣、徐世榮、江明修、朱雲漢、王順民等，轉引自官有垣，二〇〇〇）的判斷，台灣情形恐非如此，在參考援引時不得不察。的確，台灣情形到底如何恐須更多研究探查。西方學理適不適用本地也應多所考慮。不過我們認為，如果從形塑可欲價值的「程序」來思考這項如何維繫可欲社會價值的「程序理論」來說，本文中所指陳的觀點，頗值得我們參考。因為相對於「實質理論」所提出的種種價值規定，以「力場」以及「中介協調」特色刻劃「志願部門」的「程序理論」，在預留極大自主空間的前提下，提供了不同社群以各自風俗文化來形塑自身生活的餘地。而透過這種自發型式所形塑的價值標準，它不但融入了自我意志，同時也因為遵守規範就等於服從自我意志的情形下，使得社群價值受到維護。而這往往是由國家法令所強制不來的。

此外，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如果「志願部門」是項構造可欲社會價值的程序，那麼那些人可以進入這項程序參加所謂的「公共論述」共同構造價值呢？無疑的，這項問題是個大問題。我們認為這是這派說法的致命傷。從歷史經驗中得知「志願部門」往往是有間階級的產物。它在以往由領主、鄉紳們所構成，當代則以中產階級佔多數。若是如此（的確也是如此），那些衣食堪慮甚或為社會所排斥的「下民階級（underclass）」根本不可能進入這項程序之中。結果希望彼此參與公共論述、形塑彼此規範，並且以此達成社會整合的理想也就變得不可能。而這點是持此論者所未論及的。我們不能不留意。

總之，「志願部門」雖然行之久遠，但理論化的論述仍然方興未艾。或許西方學理於本地並不合用，但用以為建構適合本地理論的參考，則無不可。而這一點也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

（本文作者：王篤強為長榮管理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蘇文彬為同校通識中心講師）

◎註釋：

註一：可參考「臺灣志願服務的現況與發展研討會」（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二〇〇〇）論文集。

註二：「福利多元主義」的主旨在指出各式福利國家中採取「國家取向」的福利供

給體制具有影響家庭中婦女地位、妨害民主參與、以及弱化非正式部門福利供給等缺點。因此，它倡議多元化的福利體系，以平衡獨尊某一部門的缺陷。而在具體的實踐上，它一方面主張國家分權，認為國家應自服務供給者角色中退出，並轉型為規範者、服務購買者、品管人、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門從事服務供給者的角色；再方面它則藉由鼓勵志願部門的參與，填補國家所遺留之空缺，並摒擋市場勢力過度膨脹，以收整合福利服務、促進福利供給效率、快速反應福利需求、以及強化民主參與功能之效(Johnson, 1987; Evers, 1993)。

註三：「志願部門」一詞在英美有不同的稱呼。Evers(1993)認為它主要是英式的用法，但Til(1988)則認為它是一般慣用語。不過在美國學界中則比較常使用「第三部門」來表示(Evers, 1993; Til, 1988)，而其中又以「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最常被討論(Evers, 1993)。至於在內涵上，它所囊括的是社會中扣除公領域(政府活動)與私領域(商業活動)之後所餘的部分。因此它的範圍相當的大，種類也相當的多。但彼此相似的是它們都從事商業部門及政府部門所未做的、做得不好的、以及做得不夠的事(Til, 1988)。

註四：關於civil society，根據《二十世紀社會思想辭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 Thought)(Outhwaite and Bottomore, 1993)的解釋可以得知，這項詞彙源自於希臘，而且直至十八世紀之前它大抵上與希臘文中的「polis」同意，指的是「國家(state)」或「政治上的社會(political society)」。所以簡單說在此時期的「公民社會」其實就是公民從事政治活動的領域。不過，如果我們參考霍布斯、盧梭、洛克等人以它相對於未受國家保障前的自然狀態來說，那麼或許civil society理解為「文明的社會」也未嘗不

一)。然而，時至十八世紀下半葉，諸如潘恩(Tom Paine)、亞當斯密、佛格森(Adam Ferguson)等人逐漸將此一詞彙與國家作出了分析上的區分，使它不再如同過去般等同於國家(Keane, 1988)。到了黑格爾在《法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中更賦予它新的涵義，使它清楚的成為有別於國家(代表理性的政治社會)、有別於家庭(代表親情的自然社會)之外的一個新的領域。在這個新的領域中黑氏認為雖然也有如同志願團體般抑制市場理性過度膨脹的機制，但大體上還是受自利的市場經濟力量所主導(Outhwaite and Bottomore, 1993)。所以取其偏重市場交易之義，理解為「市民社會」(石元康，一九九〇；陳其南，一九九三)。而黑氏這種看法為後人提供了一個概念架構，往後諸如馬克思、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則大體上是站在這個基礎上做不同偏重的進一步論述。但是以上的說法，如果依照泰勒(Charles Taylor)的看法，只是「公民社

會」理論的洛克傳統，相對於洛克傳統的還有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傳統，在這項孟氏傳統中如果用托克維爾的話說就是比較強調以民間組織這項中介團體對抗溫和專制的傳統。其中由社會中的公民所自發成立的民間組織。我們或許可稱之為志願部門，它對民主政治的鞏固有相當助益。而由此所形成的社會領域我們以為以「公民社會」稱呼當不致不當。

註五：或許俚俗中所謂「認錢不認人」很可以貼切表達此意。由於一切以金錢為度量，所以自然地也就打破了過去基於身分地位乃至種族膚色而來的差別對待，所以個人的喜愛與偏好也可以藉此得到尊重與滿足。

◎參考書目：

王紹光 一九九一 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 二十一世紀 八 一〇二——一四
 石元康 一九九〇 特殊性原則與現代性：黑格爾論市民社會 當代 四七二〇——二八
 官有垣編著 二〇〇〇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福利

台北亞太

陳其南 一九九三 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與市民社會的可能性 當代 八一 八二——九三

江明修 台灣非營利組織研究網
<http://npo.pad.nccu.edu.tw/index.htm>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二〇〇〇 「台灣志願服務的現況與發展」 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Evers, A. (1993) "The Welfare Mix Approach: Understanding the Pluralism of Welfare Systems" in A. Evers and I. Sveldik (eds) *Balancing Pluralism* Brookfield: Avebury.

Johnson, N. (1987) *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Keane, J. (1988) "Despotism and Democrac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1750-1850" in John Keane ed. *Civil*

New York: Verso.

Outwaite, W. and Bottomore, T. (eds.) (1993)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Til, J. (1998) *Mapping the Third Sector: Voluntarism in a Changing Social Economy*. New York: Foundation Center.

Wuthnow, R. (1988)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